

#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时间始末考论

李慧国

(河西学院美术学院, 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国画大师张大千率门人子侄西赴大漠敦煌临摹壁画,遂使世人得以窥见敦煌壁画艺术之真容。关于这段敦煌临摹的经历,艺术界习惯用“面壁三载”来形容张大千一行之艰辛。然则,通过对这段史实的梳理,便会发现张大千敦煌之行实际并不足“三载”。虽然前后耗时共计2年6个月,但是张大千在敦煌和安西的时间加起来却只有1年7个月,实际临摹时间只有13个月,在莫高窟的临摹时间还不足1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临摹出200多幅高质量的壁画作品,更加彰显了张大千敦煌之行伟大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面壁三载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20.03.007

**中图分类号:**K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20)03-0041-05

在中国美术史上,张大千并不是第一个远赴敦煌临摹壁画的画家,但却是第一个系统临摹敦煌壁画并且研究、传播敦煌壁画艺术的画家。也正是由于张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的壮举,才使世人得以窥见敦煌壁画艺术之真容,并直接促成民国政府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掀起了现代“敦煌学”研究的热潮。

## 一、朝圣敦煌的缘起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张大千青年时期跟随曾熙和李瑞清两位恩师学习书法时,就时常听两位老师说起敦煌的藏经洞和被西方人掠走的古代写经。三十年代初,张大千与哥哥张善孖同住在苏州网师园,哥哥的故交好友叶恭绰也经常向张大千介绍敦煌莫高窟的文化瑰宝,并从友人藏品中介绍散落的敦煌文物及绢画给张大千见识,使青年张大千对敦煌壁画心生向往。叶恭绰曾力劝张大千重振人物画一脉,以改近三百年之颓废“人物画一脉,自吴道玄、李公麟后已成绝响,仇实父失之软媚,陈老莲失之诡譎,有清三百年,更无一人焉。”<sup>[1]</sup>多年以后张

大千感念叶公回忆道:“西去流沙,寝馈于莫高、榆林二窟者近三年,临摹魏、隋、唐、宋壁画,皆先生启之也。”<sup>[2]</sup>“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张大千化装逃出北平,绕道入蜀,隐居青城山上清宫。期间与曾任“监察院”驻甘、青、宁等地“监察使”的友人马文彦和严敬斋相叙。二人均曾去过莫高窟,对张大千盛赞敦煌艺术的伟大,并鼓励其前往观赏钻研。后来张大千自己也曾回忆:“谈起敦煌面壁的缘起,最先是听曾、李两位老师谈起敦煌的佛经、唐像等,不知道有壁画。抗战后回到四川,曾听到原在监察院任职的马文彦讲他到过敦煌,极力形容有多么伟大。我一生好游览,知道这古迹,自然动信念,决束装往游。”<sup>[3]</sup>

其实,早在张大千之前已有画家西涉大漠到莫高窟临摹壁画,最为著名的要数画家李丁陇。李丁陇(原名李玉声),河南新蔡人,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曾入上海美专学习,后在西安与妻子郑墨军创办伉俪艺术专科学校(后改名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也称西安艺术专科学校)。建国后先后任上海学院、上海商专和上海师范学院教授,1999年在上海去世,享年

收稿日期:2019-07-01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张大千敦煌艺术考察史实研究”(ZDQ2017-07)

作者简介:李慧国(1983—),男,甘肃古浪人,河西学院美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

95岁。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时,李丁陇刚从上海美专毕业,决意北上投身抗日队伍。“1938年冬,一支由13位青年人组成的赴莫高窟探险队伍从西安出发了,其中女性3人,李丁陇自任探险队长。”<sup>[4]91</sup>数月后李丁陇与敦煌籍青年刘方抵达敦煌,只身一人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八个月之久,后于1939年夏离开敦煌返回西安,并于1939年冬在西安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展览”,展出巨幅画作《极乐世界图》《千乘千骑图》。据王忠民先生《李丁陇与敦煌壁画》(《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考证,李丁陇本次展出的巨作《极乐世界图》因尺幅巨大在西安无人能裱,带往成都装裱时经画店老板引荐与张大千结识。“张大千来到画店,看了李丁陇的画后连声叫绝,并叫店家到李丁陇住宿处请他,两人在一起攀谈了许久,对李丁陇的画大加赞赏,并且说:‘你为敦煌艺术做了一件大好事!’张大千从此便对敦煌的壁画十分向往,终于1941年亲赴敦煌考察。”<sup>[4]93-94</sup>

由此可见,张大千决意朝圣敦煌是与几位年轻时的师友故交有着莫大的渊源。就影响张大千作出朝圣敦煌的抉择而言,曾、李二师是最早的介绍者,叶恭绰是后来的开启者,马文彦和严敬斋是重要的激发者,李丁陇是关键时刻的催化者。不惑之年的张大千与敦煌壁画临摹的先行者李丁陇在成都的相遇、相识才是张大千决心奔赴边陲大漠一探究竟的直接动因。

## 二、远赴敦煌的始末

1940年10月<sup>①</sup>中旬,张大千与赵望云相识于成都<sup>②</sup>,拟赴敦煌。是月中旬,张大千从成都坐汽车出发,计划北上取道广元、天水、兰州去敦煌。“11月上旬,先生行至广元,刚参观完千佛崖石刻,正欲动身往甘肃麦积山,在旅馆忽接由重庆辗转发来之报丧电报。先生哀莫能已,痛失长兄,热泪长涕,遂仓促返渝奔丧,中断了敦煌之行。”<sup>[5]128</sup>这是张大千第一次敦煌之行,因二哥张善孖病逝重庆,中途返回奔丧,未能成行。

1941年5月初<sup>③</sup>,张大千再次动身,携三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由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准备经由河西走廊前往敦煌。张大千一行抵达兰州数日后,与时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孙宗慰(徐悲鸿学生)会合,而后赴青海西宁市塔尔寺参观<sup>④</sup>。同月返回兰州,旋即经武威与著名书画家范振绪(时任甘肃省临时

参议会副议长)相伴而行,西赴敦煌。途中路过安西县城,大千一行参观榆林窟约四五日<sup>⑤</sup>。据莫高窟第323窟南壁一则铅笔题记“下边的残迹,是因为英国的斯坦因来到此地,他用西法,将这一片好壁画粘去了,噯!你想多么可惜呀!民国三十年六月十六日<sup>⑥</sup>□□□、□□□、孙宗慰、范振绪到此记”(见图1)推测张大千一行抵达莫高窟的确切时间应在1941年6月中上旬,距离动身出发已一月有余。



图1 孙宗慰、范振绪题记(张伟文摄)

初到敦煌,张大千主要的工作是为洞窟编号。编号及测绘记录工作持续到年底,历时5个多月共编洞窟309号。10月5日(农历八月十五)<sup>⑦</sup>,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来莫高窟参观,张大千呼吁政府设立莫高窟专门管理机构,临别时大千让心智随车至兰州前往西宁市塔尔寺邀请藏族喇嘛画师。编号工作持续到11月底方告结束,张大千整装前往西宁过冬。12月初路过榆林窟,临摹壁画20余天。现今榆林窟第16窟主室甬道北壁上还有大千题记:“辛巳十月二十二日<sup>⑧</sup>,蜀郡张大千临写一周题记”(见图2);第25窟西壁题记:“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见图3)。12月下旬,张大千离开榆林窟,行往武威。年底,先生离武威经永登、窑街赴青海西宁<sup>⑨</sup>。

1942年2月底,张大千和孙宗慰赶到塔尔寺<sup>⑩</sup>。5月底,张大千父子及5位藏族画师,携新置办的大批画材从西宁出发重回敦煌,开始大规模的壁画临摹。8月,应先生召,夫人黄凝素携幼子心澄、夫人杨宛君、侄儿心德,门人肖建初以及故交谢稚柳赶来敦煌协助临摹。11月,门生刘力上来敦煌。12月底,张大千偕谢稚柳率子侄门人赴西千佛洞考察三日,为其编号19窟<sup>⑪</sup>。



图2 张大千题记(采自《榆林窟》,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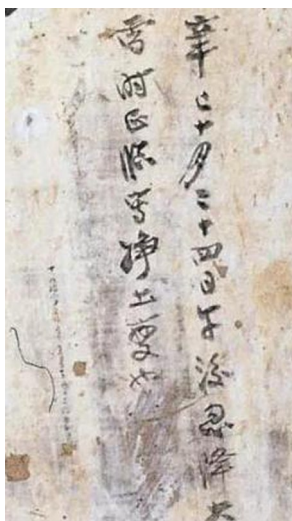


图3 张大千题记(孙志军摄)

1943年3月底,常书鸿来敦煌。4月下旬,先生指挥门人子侄忙于部分壁画摹品的收尾和对壁画临摹品的装运工作。5月初,先生一行离莫高窟赴榆林窟。张大千一行在榆林窟又展开编号、临摹(见图4)一月有余。此间,为榆林窟编号29窟,水峡口石窟编号6窟<sup>⑥</sup>。水峡口石窟第1窟现存张心智墨书题记二则“中华民国卅二年五月十二日,蜀人张颖心智时别榆林纪念”(见图5)“中华民国卅二年六月,蜀郡张颖来此,时别榆林窟”(见图6)可知张大千一行在榆林窟的停留时间当在1943年5、6月份。

6月中旬,张大千一行离开榆林窟,月底抵达兰州。张大千寓居兰州两月余,整理画作,筹备举办临摹壁画展览。“8月14日,《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三青团大礼堂隆重开幕……《西北日报》曾头版头条刊载《介绍名画家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启事》”<sup>[5]171</sup>8月底展览结束,10月初,先生一行包租客车货车各一辆,离兰返川<sup>⑦</sup>。10月中旬,车到广元,张大千一行参观千佛崖(见图7)。抵达成都



图4 张大千在榆林窟(罗寄梅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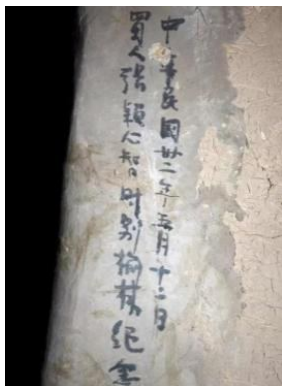


图5 张心智题记(孙志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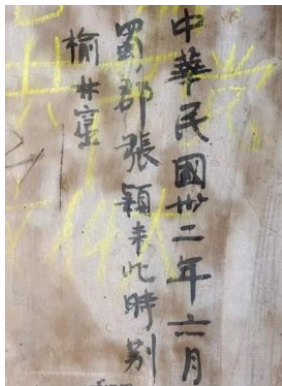


图6 张心智题记(孙志军摄)



图7 1943年秋张大千在广元千佛崖与友人合影  
(采自广元千佛崖历史陈列馆)

时已是金秋时节的10月下旬了<sup>⑧</sup>,就此结束了整个敦煌之行。

表 1 张大千敦煌之行及考察、临摹经历的主要时间列表于下:

时间	地点	事务	时长
1941 年 5 月初	成都	动身飞往兰州	1 月余
1941 年 6 月中上旬	敦煌	到达莫高窟	
1941 年 6 月至 11 月	敦煌	莫高窟考察、编号	6 个月
1941 年 12 月	安西	榆林窟临摹	约 20 天
1942 年 1 月至 5 月	西宁	西宁过冬,塔尔寺考察	5 个月
1942 年 6 月至 1943 年 4 月	敦煌	莫高窟临摹	11 个月
1943 年 5 月初至 6 月中旬	安西	榆林窟临摹	1 月余
1943 年 6 月底至 10 月初	兰州	寓居兰州,筹办展览	3 个月
1943 年 10 月初至下旬	四川	返回成都	1 月

张大千自 1941 年 5 月初出川至 1943 年 10 月末返回成都,前后共计 2 年 6 个月,并非 3 年之久。其在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也只有 1 年 7 个月,除去初到敦煌为莫高窟编号的半年,张大千用于壁画临摹的时间只有 13 个月,其中在莫高窟临摹 11 个月,榆林窟先后两次临摹约计 2 个月(见表 1)。所以,一直以来艺术界所流传和近现代美术史中所描述张大千远赴敦煌临摹“面壁三载”的说法是不合史实的,是一种夸张的、带有文学化的浪漫描述。

### 三、面壁敦煌的意义

张大千远赴敦煌,在莫高窟与榆林窟共摹得壁画的数量比较权威的切实数字见于《张大千九十纪念展书画集》(1989 年)和《梅云堂藏张大千画》(1993 年)二书所附的《年谱》,都说是 276 幅。仅现今四川博物院所藏壁画摹本就有 173 幅,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 68 幅。张大千及其门人子侄在短短 13 个月的时间里临摹得这么多数量的壁画作品,还有大量线描样稿,实属不易。其中不乏宏幅巨制,如四川博物院所藏的《劳度叉斗圣变》宽 3.5 米、长 10 米,面积近 35 平方米。可以想象,张大千一行在敦煌的临摹工作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苦和努力。仅此番对艺术事业的执着与坚守,也展现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超凡的人格魅力。

张大千虽不是第一个远赴敦煌临摹壁画的画家,但张大千是第一个远赴敦煌,对敦煌石窟艺术展开系统的考察、研究、临摹、宣传乃至呼吁政府进行遗产保护的艺术家。“大千先生是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三人,也是中国人中以个人力量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sup>[6]</sup>张氏编号的英文代号为“C”,目前国际敦煌学界仍将其作为重要的标准之一。张大千是对莫高窟进行全面田野考察、整理、测绘、记录的第一

位中国学者,他用初到敦煌的半年时间进行此项工作,并辑成《莫高窟记》。后因次年邀请故旧好友谢稚柳前来协助完成莫高窟遗存的全面整理工作,张大千全身心投入到壁画的临摹工作中,敦煌之行结束后,谢稚柳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记》、《敦煌艺术叙录》,张大千遂将此国内最早的莫高窟考察笔记《莫高窟记》搁置起来,直到张大千去世后,台北故宫博物院才为其整理出版了约 20 万字的《张大千先生遗著莫高窟记》(1985 年)。此外,张大千还整理、记录了榆林窟、水峡口石窟的遗存状况,留下了大量的考察笔记手稿(见图 8),这批手稿,成为现今敦煌学研究的珍贵考古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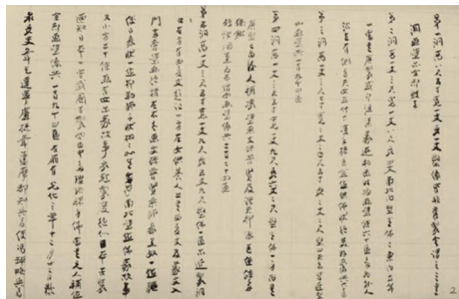


图 8 张大千榆林窟考察笔记手稿(四川博物院藏)

正是因为张大千自发组织的艺术考察及其后在全国多地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览,才使得国人和政府对敦煌的关注热情空前高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和“敦煌学”研究热潮的掀起,张大千作为一位职业画家,居功至伟。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曾盛赞张大千:“自敦煌宝藏发现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之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

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sup>[7]</sup>

张大千敦煌此行不仅以大量临摹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传统绘画灵魂精神之所在,向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艺术家群体指明了一条民族艺术复兴之路,还开启了现代“敦煌学”研究热潮。段文杰、史苇湘等一大批“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就是在张大千敦煌之行的人格魅力及临摹展览作品的艺术魅力感召之下,不远万里齐聚大漠边陲,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毕生心血付诸了敦煌艺术的研究事业。

#### 注释:

- ① 本文所涉及年月除引录题记内容及特别注明农历外,一律为公历。
- ② 据《张大千年谱》(1987年版)所载为1940年春,先生与关中名画家赵望云在成都结识,一见如故,顿成密友。
- ③⑦⑨⑩⑬ 据《张大千年谱》所载。
- ④⑭ 据张心智《张大千敦煌行》(《张大千生平和艺术》1999年版,第52—89页)一文所载。
- ⑤ 据张心智《张大千敦煌行》一文所载,心智因病,没能随同参观。
- ⑥ 此题记中“孙宗慰”前两处人名被人为铲除,据敦煌研究院丁淑君考证“第323窟题字虽非张大千书,但所擦除的文字中应有‘张大千’诸字”(《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

第144页);落款民国30年6月16日为农历五月廿二日,与敦煌文物研究所退休老工人李复的回忆张大千是1941年旧历五月间第一次来敦煌”(《张大千生平和艺术》1999年版,第93页)相符合。

- ⑧ 辛巳年十月二十二日为公历12月10日,如此推算,张大千于12月3日前已到榆林窟。
- ⑨ 据孙宗慰回忆“1942年阴历元宵节前赶到塔尔寺,主要为看塔尔寺庙会”。
- ⑫ 据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1996年版)序文。

#### 参考文献:

- [1] 包立民. 张大千的艺术圈 [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80.
- [2] 张大千. 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序 [M]//叶恭绰. 叶遐庵先生书画选集. 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5:1.
- [3] 谢家孝. 张大千的世界 [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3:125.
- [4] 王忠民. 李丁陇与敦煌壁画 [J]. 敦煌研究, 2000(2): 91-94.
- [5] 李永翘. 张大千年谱 [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6] 魏学峰. 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时代意义 [J]. 敦煌研究, 2006(1):17.
- [7] 陈寅恪. 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 [M]//四川省美术协会.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 成都:西南印书局, 1944.

##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Time When ZHANG Daqian Copied Dunhuang Frescoes

LI Huiguo

(School of Fine Arts,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China)

**Abstract:** In early years of the 1940s, the master ZHANG Daqian led his disciples, sons and nephews to western China to copy frescoes in Dunhuang. This gave people a chance to have a look at the artistic treasure. The art circle usually described the ZHANG Daqian's hard experience "facing wall for 3 years". However, through sorting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found that ZHANG Daqian had not stayed at Dunhuang for three years. Though he spent 2 years and 6 months for his travel, the time he stayed at Dunhuang and Anxi was summed up to 1 year and 7 months. The time he spent for copying was only 13 months. And the time he spent at Mogao Grotto was less than 1 year. In such short time, he copied over 200 paintings with high quality. This has fully shown the great value of ZHANG Daqian's travel to Dunhuang.

**Key words:** ZHANG Daqian; Dunhuang; copy frescoes; facing wall for 3 years

(责任编辑:王长安)